

上海三联书店

视点 3

吴士杂 主编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背叛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

欧阳景根 选编

PERSPECTIVE

视
点
3

吴士余 主编

背叛的政治

—— 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

欧阳景根 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 欧阳景根编选，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观点丛书·吴七余主编)

ISBN 7-5426-1735-4

I. 背… II. 欧… III.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496 号

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

编 者/欧阳景根

责任编辑/刘宏伟

装帧设计/范崎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e.com>

E-mail: sanliane@online.sh.cn

印 刷/江苏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8.5

印 数/1—4100

ISBN7-5426-1735-4

C·36 定 价 18.00 元

视点

策划人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21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分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合、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线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地

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传承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是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了，以人文学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在为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承传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术

文化的思维空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有是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在评判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有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会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视 点

主编/吴士余

Perspective

1 /欧阳景根 前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
的第三条道路

·理论经纬·

13 /约翰·霍姆伍德 重谈公民和市场:
新自由主义和“第
三条道路”

29 /约翰·霍姆伍德 新的进步宣言:信
息时代的政治哲
学

35 /艾森开普斯坦 第三条道路理论

对话平台·

49 /克林顿、布莱尔等 把思想变为行动

·政党观察·

63 /罗伯特·菲利波特 新民主党、新工
党

71 /大卫·阿诺德 工党的经济政策与竞争态势：对第三条道路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民主批判

89 /格林恩特 新工党的思想体系

·文本解读·

103 /克里斯托夫·格林·佩德森等 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还是
其他？

129 /尤妮斯·劳森 第三条道路与社区政治

147 /史迪芬·德莱威 福利改革在哪告别第三条道路？

167 /威尔·马歇尔 民主现实主义：第三条道路

·另类诠释·

177 /爱德华·S·赫曼 背叛的政治

185 /保罗·坎马克 吉登斯如同语义工程的“第三条道路”

201 /威尔·莱格特 将第三条道路回归其本真：发展和批判策略

·前瞻领域·

219 /特里·保德曼 第三个千年：第三条道路还是第三德意志帝
国？

233 /艾森·B·卡普斯坦 全球性第三条道路：社会公正与世界经
济

·关键词·

257 /欧阳景根 第三条道路术语

前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第三条道路

欧阳景根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再到近代的洛克、亚当·斯密，再到现代的罗尔斯和吉登斯，他们都在追求着一种社会正义，并力图把他们笔下的社会正义当成永恒的主题。不管这个社会正义是民主、平等（不管是起点的平等还是终点的平等）还是自由，或是上述诸要素的结合，但这些东西看起来多少有点像乌托邦。这些思潮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是“超越了”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也都是在追求着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一乌托邦就是永恒的政治主题，即社会正义。然而，相信有实现这一永恒正义的不同的路径和方法。这些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就是各个时代的时代主题，也正是现实的变迁，会使得善于反思的资本主义，会在实现永恒正义的天路历程中寻求并探索出这么多的方法。

市场的力量（换一个角度看是市场的破坏力）已经使得社会正

义这一时代主题在今天变得更加突出起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①已经所向披靡,它在建设和创造的同时,也在摧毁和破坏。正如保罗·瓦累利(Paul Valery)所说的,“人类的整个问题就落到这样的地步:人类思想是否能控制人类思想所产生的破坏?”

在吉登斯看来,晚近历史上的两大资本主义思想: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给人类造成了破坏。^②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弥补、完善、整合这两大思想,并修复它们所带来的破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他的复兴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三条道路,来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③,从而来实现人类的永恒正义、自由与平等。吉登斯是以一种矛盾的心理来看待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他一方面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一人类思想所带来的破坏是,它造成了社会的异化、排斥和不平等;而另一方面又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认为,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或福利制度的恶果却是,“给它所设想的(福利制度的)受益者——被它确定为弱小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那些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精神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一种一触即发的仇恨”。^④因此,吉登斯就要提出另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以一种从资本主义诞生以

① 华盛顿共识,最初源于西方国家为解决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而达成的共识。1990 年 4 月,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总结出来。后来,它成为指导七国集团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把握世界经济的信条。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为“自由市场和货币稳定”。华盛顿共识不仅代表华盛顿,而且代表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国际市场参与者及债权人。

②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 年 1 月第一版,页 27。

③ David Marsland: *Welfare or Welfare Stat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p197.

来就出现的拯救资本主义的悲观传统,来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并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可以说,吉登斯是要解决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而他开出的药方却是,试图在抛弃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即试图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富有活力,又让社会以团结一致为基础,^①从而实现吉登斯理想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正义。

从《超越左与右》到《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再到《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可以说,吉登斯在逐步完善着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自从吉登斯提出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以来,第三条道路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吉登斯本人也遭受着来自各国理论界的褒奖或批评。他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一书中把学术界对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批评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第三条道路内容空洞,没有明确的方向;第二,没能与传统左派的思想保持一致,有意无意地倒向了保守主义;第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框架,特别是其对全球市场的关注;第四,本质上,它是盎格鲁—萨克逊方案,深深地刻着它得以产生的社会的烙印;第五,除了信奉市场的能力之外,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②事实上,以上对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批评也不无道理。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全

^① 《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与变革》,陈林、林德山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导言,页4。

^② 《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安东尼·吉登斯著,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页23—26。

面论述了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在他的头脑中，第三条道路的价值有：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他的平等观与传统左派的平等观有所不同。传统左派强调的是，借助公共权力来实现结果的平等，而吉登斯强调的却是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而起点与机会的平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也都在标榜一种起点与机会的平等。只不过它们并没有像吉登斯那样去把它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政策主张，因而，表面上给人一种它们漠视不平等的印象。他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种哲学上的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一条中间道路，形象地说，他的主张可以表述为“既要社会民主主义的……，又要新自由主义的……；既不要社会民主主义的……，又不要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话语经过了认真的设计，想以此来掩盖英国工党政策其实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延续。布莱尔的批评者则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撒切尔的政策^①，而左派却批评它其实是在延续新自由主义。因而，这确实是一种左右摇摆、目标不明的主义。他找到了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线，同时，他也在尽力划清他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界线，但他没有做到，他所要划定的界线是模糊的、移动的。它是一种完善主义的思想，是一种人为裁剪的结果。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受到传统左派与新右派的批评，就像戈尔巴乔夫在实行改革时，保守派批评他过于激进，而激进派又批评他过于保守因而同时受到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评一样。

①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页 27。

吉登斯要用积极的福利政策来取代传统工党的消极的福利政策,用社会投资型国家,来培育公民的责任感,要为福利对象提供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它要强调公民责任意识,并以此来实现他所谓的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包容,从而实现他的理想王国。

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就是博大精深的自由主义思想。而第三条道路思想却找不到它的理论立足点。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思想,发现了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却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什么,相反,它继承的东西要比它所超越的东西多得多。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声称“意识形态终结了”,无独有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也认为“历史终结了”。不管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好,还是历史的终结也好,但从事后人们对这种终结的溢于言表的兴奋与紧张之情,就可以看出这种意识形态在未终结之前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是把它化为具体的政策。这种政策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至在运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与政府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联盟。这种联盟既可以体现在国内事务上,也可以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特殊的意义上,政策也可以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具有可选择性。意识形态天性就具有霸权色彩。在它的阴影笼罩下,即使是一个宽容的、多元的社会,其他的思想也会发育不良。它吸取了其他思想发育的养料,却同时又阻止着其他思想的发展(不管这种阻止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选择,那它可能会推动历史的前进和自身

的发展，否则，便阻碍历史的前进和自身的发展。但对意识形态的选择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作出的选择，比如资本主义在西方，以及社会主义在中国，这都是一种历史作出的选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有一种选择是人为的选择，比如工党政府或民主党政府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它是强加的，有风险的，前景无法预测的。

众所周知，第三条道路已经作为一种政策或发展战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地采用。随着它被欧美发达国家的工党或民主党政府的普遍运用，毫无疑问，它现在已经从原来的一种理论和理论基础上的政策层次，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官方意识形态，它被广大国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奉为一种摆脱困境的法宝。换句话说，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成了工党政府或民主党政府的标志，而工党政府与民主党政府也就成了第三条道路这样一种政策的代名词。

正因为意识形态的这种对人类历史影响的天赋的重要性，因而今天兴起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现在仍然如日中天，却也在接受着学者们的审视与思考。学者们担心，一旦这种人为的意识形态选择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的霸权，也由于它的路径的依赖惯性，那它就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无可估量的后果。

可能人们会问，政治家们眼中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他们又为何要选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呢？他们眼光里，这种已经具体化为政策的意识形态，在实行过程中又遇上了哪些问题呢？我们选取了一组文章，从各个角度来对具体化为政策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解析。其中，通过这些奉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心灵告白，来显示他们是如何做出这种意识形态的选择的，来显示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解。

在人们看来，老牌左翼试图抵制变化，而工党则和高税收、特殊权益及庞大政府联系在了一起。新右翼又认为：一切问题，只要摆脱政府，就能迎刃而解。而布莱尔总是认为，他们忽视了破坏社会团结的真正因素。他的工党的中间派和中偏左派正在经历着重新发现的过程。他相信他们真正致力的是团结、机会、责任这样一种政治（参见《把思想变为行动》一文）。他要为政府界定一个新的角色。社会方面，他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观念。所以他要选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在施罗德看来，因为发现前两条道路行不通。所以他需要确保社会中尽可能多的人分享机会，同时又承担义务。而对克林顿而言，对民主党来说意味着，必须证明他们能够驾驭经济，同时又可以应对社会公正的全部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些考虑，这些政治家们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对第三条道路政策核心的福利改革，学者们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史迪芬·德莱威认为，福利改革并没有表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左派人士之所想。新措施及其相关的政策，它们并没有激励出社会公正，甚至是在放弃社会公正，以至还提倡了社会排斥。一个不断推崇“工作第一”的政策并不能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福利改革必须告别第三条道路（参见《福利改革在哪告别第三条道路》）。约翰·霍姆伍德认为，新的进步政治依赖于三个要素——三个能从美国民众传统的进取精神中所寻找的理想—机遇平等，共同责任，自治。新的进步的政体要像上个世纪的进步主义纲领一样，成为多数人奋斗的目标。因此第三条道路是合理的（参见《新的进步宣言：信息时代的政治哲学》）。

学者们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不同于政治家们的理解。克里斯

托夫格林·佩德森、基斯万·克思勃根和安东尼·赫姆里克认为，打着“第三条道路”的标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政治似乎重新获得了思想领域的先手。他们认为“第三条道路”已经超越了一条新的标语口号。“第三条道路”应该被看做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新的社会民主反响，在此经济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已不再适用，同时，社会民主派在就业和平等之间也面临着一次严峻的交换（参见《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还是其他？》）。

约翰·霍姆伍德对福利是以经济的良性发展为潜在代价这一当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们暴露了其对市场模式以及新自由主义设想不加鉴别地接纳。他借用卡尔·博兰尼的观点，论证国家福利与市场之间的不满以及常规对立，是不能仅靠质疑其中一方来解决的。他最后还认为，政策定义会产生不良后果，并造成“秩序”混乱。对市场的抵抗并不是对“理性”的抵抗。尽管，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所期望的是不均衡的，然而，通过允许“市场”的一致性则可达到政策整体的明显一致性。如果批评起不到任何影响的作用，此领域则会走向非理性状态。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甚至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专利，它可以同时成为一大群类似政党的群体的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武器，哪个政党也离不开它。这样，它的兴衰荣辱就不仅与某个政治领袖密切相关，还与某个政党利益攸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还与其他民族国家密切相关。比如威尔·马歇尔在《民主现实主义：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就认为，尽管美国外交政策通常执行迟缓，但克林顿政府已经接受了民主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它坚定地支持在共同的全球化原则下开放市场，拓展贸易，并强调了美国对外经济化的领导地位和国

内繁荣的密切关系。在民主扩展和扩充北约需求方面，政府已把他们的安全与逐渐展开的自由经营和民主自治连接起来。政府对从索马里到巴尔干半岛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涉的意愿，不仅仅是表明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也是对英国首相布莱尔所称之为国际共同体这一新的学说的承诺。因此，我们还选择了一组文章，看看学者们是如何从政党的角度来对第三条道路进行另一种探讨。

罗伯特·菲利波特认为，英国新工党的兴起与美国新民主党之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西洋两岸的改革者都面临着来自既渴望改革同时又害怕改革的选民挑战。美英两国选民对迅速的经济全球化和科学进步的影响都感到无所适从。如果布莱尔能修改几条旧工党不可更改的条款的话，不但能证明他对改革的严肃性，而且还能确保其信念的正确性。新工党自掌权以来，一直在努力加强新的工人中产阶级的联合，这就是布莱尔新工党面临的困境与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原因（参见《新民主党，新工党》）。

《第三条道路理论》一文的作者，强调了当代社会条件在我们思想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新工党不太关心政治原理，而政策是由某种社会现实制定出来的，而并非由民族原则制定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公民权利理论、共产主义及基督教的某些道德标准都是新工党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但它们没有一个占领先地位的。《新工党的思想体系》一文主要指出，英国政府（特别是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打着第三条道路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在复兴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以它作为工党的理论指南。

基于对第三条道路理论上的探讨，学者们对第三条道路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批判。

威尔·莱格特对怎样把现有理论探索引向对第三条道路的批